

拉美研究丛书

Latin American Studies Series

◆ 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专题报告 ◆

全球金融危机： 挑战与选择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allenges & Options

吴国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O DE AMERICA LATINA
ACADEMIA DE CIENCIAS SOCIALES

当代世界出版社

拉美研究丛书

Latin American Studies Series

◆ 201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专题报告 ◆

全球金融危机： 挑战与选择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allenges & Options

吴国平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O DE AMERICA LATINA
ACADEMIA DE CIENCIAS SOCIALES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金融危机: 挑战与选择 / 吴国平主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090 - 0471 - 5

I. ①全… II. ①吴… III. ①金融危机—研究—世界
IV. ①F831.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0572 号

书 名: 全球金融危机: 挑战与选择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3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010) 839084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5
字 数: 36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0 - 0471 - 5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拉美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名誉主编：成思危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苏振兴	李北海	李金章	陈凤翔	洪国起
原 焘	蒋光化	裘援平	蔡 武	

主 编：郑秉文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华	王宏强	王晓德	刘纪新	刘承军
杨万明	吴白乙	吴志华	吴国平	吴洪英
沈 安	宋晓平	张 凡	陈笃庆	林被甸
郑秉文	赵雪梅	贺双荣	袁东振	柴 瑜
徐世澄	徐迎真	康学同	曾 钢	韩 琦

学术秘书：刘东山

《拉美研究丛书》总序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 33 个国家，总人口 5 亿多，经济总量高达 1.8 万亿美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然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我国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对象，也是共同构筑和谐世界的重要伙伴。

我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发展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关系。早在 1988 年，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发展的前景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人们常讲 21 世纪是太平洋时代……我坚信，那时也会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他还指出：“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2004 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的重要指示。2004 年 11 月 12 日，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作演讲时指出，中拉关系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如下发展目标：（1）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2）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3）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

我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有着相似的经历，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我国高度重视拉美在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对与中国的交往及合作持积极态度。

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的会长，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中拉关系发展迅速。许多拉美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纷纷到中国来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访问拉美。特别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古巴四国；2005年1月，曾庆红副主席又访问了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牙买加。至今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了“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智利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许多拉美国家的议会都保持着较密切的交往，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美洲国家组织和拉美议会的观察员，和里约集团、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都有联系。中国与拉美国家在经贸领域中的合作也已全面展开。在1993—2003年的十年中，中拉贸易额增长了近六倍。2005年，中拉贸易额首次超过500亿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唯一专门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科研机构，成立于1961年。长期以来，该所科研人员完成了大量科研成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2006年开始，他们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一套《拉美研究丛书》，以满足我国外交部门、企业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媒体以及公众对拉美知识的需求。我深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增进中国各界对拉美的了解，也将对促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友谊及合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戚思危

2006年5月2日

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李 扬

在国内，人们一提到拉美和加勒比，通常会在脑海中迅速浮现出“热情”、“浪漫”和“足球”。那片富饶的土地曾经孕育出令人瞩目的繁荣，古老的印第安文化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在漫长的殖民地时期，丰饶的资源给这个地区留下的却是贫穷与落后，同时也使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数百年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及其人民一直在努力探索走向繁荣与富强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并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坚持不懈的探索。

18 世纪末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独立战争拉开了该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变革的序幕。19 世纪 8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独立后的阿根廷甚至一度进入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行列。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富得像阿根廷人”，就十分生动地反映出那时世界对于该地区富庶的侧目。但是就整个地区而言，在独立战争后的漫长时期内，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使得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的地位，无法充分享受到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创造的全部财富。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开创了全新的发展历史。在源自其本土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理论指导下，这个地区的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从农村向城市化的转型，在发展中国家中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些国家跨入了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

但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1982 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而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又经历了失去的 10 年，在此期间又先后于 1994 年末和 1995 年初、1999 年及 2001 年遭遇了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危机的“温床”。然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努力，在同危机的斗争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其改革的路径和发展的新模式。值得庆幸的是，在此次由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拉美的这种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其不断改善的经济和金融结构，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抵御危机冲击的能力，也为其应对危机的政策调整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随着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且阴云持续不散，拉美经济遭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在加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与前面提及的几次源自本地地区的危机相比，此次危机对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整体影响却相对要小。尽管在目前世界经济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形势的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但是，总结该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将债务危机同其后发生在 3 个地区大国的危机以及此次危机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除了从财政和金融制度安排、过度的财政赤字、资本自由流动下过度借债所导致的货币错配等方面分析危机的成因外，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更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协调发展对拉美和加勒比经济结构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拉美地区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地区处于进口替代的“黄金时期”。当时，拉美国家普遍认为，工业化的起步

阶段必须要对其国内的产业采取相应的保护。于是拉美地区通过进口关税、非关税壁垒抑制制成品进口，同时通过汇率、产业倾斜、国有企业直接进入等手段大力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拉美地区的工业基础，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化，显然从发展空间和技术进步方面都将限制一国工业化的发展深度；随着拉美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工业原料和设备进口的需求不断增加，外汇资金缺口不断加大；另外，拉美的工业化选择具有极强的政府导向，脱离市场的工业化选择容易出现结构上的问题。因此，在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逐渐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时，其主要出口又逐渐集中在农产品和资源产品上。

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拉美的城市化进程同样突飞猛进。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比约为40%，到1980年，该比重已达到64%，1990年升至72%，1997年为78%。城市化对于助推工业化显然是有促进作用。但拉美的问题关键在于，无论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还是债务危机之后工业化战略的转变过程中，都存在产业结构发展失衡，服务业升级同样受到结构性的制约而滞后。大量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无法被有效吸纳。城市游民、贫民窟和非正规部门大量产生，任何形式的危机发生都有可能使其出现动荡甚至动乱，使得政府面临巨大压力。

第二，收入分配不合理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大量无法被有效吸纳或被迫流向非正规部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从根本上缺乏创造财富的机会，自然很难参与到收入分配中。另外，在拉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得拉美地区的收入分配出现严重失衡，整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基本处于0.5以上。低收入人群在城市的大量聚集使得拉美国家不得不分散使用有限的财政收入，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在此情况下，拉美国家逐

渐走上了举债发展的道路，从而形成国内、外的双重债务负担。

政府财政的压力同时也体现在货币政策上。在国家干预的工业化模式中，财政开支无节制地膨胀迫使货币投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即使面对已经出现的通胀，拉美国家的中央银行更多采取的是让工资与物价实行指数化管理。一旦放弃这种管理，物价增长就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1982 年债务危机之后至 90 年代初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不稳定的货币价值让货币替代成为无奈的选择。货币价值有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对内价值的标尺是物价，对外价值的标尺则是汇率。财政赤字和过度的财政开支，使得拉美地区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难以有效地实行货币供给控制，从而使得该地区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汇率方面，在进口替代时期，为了对工业发展所需进口给予补贴，拉美地区长期保持着汇率水平的高估。在债务危机之后，为了缓解汇率水平长期高估的压力，一些拉美国家逐渐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在一段时期内广泛实行了爬行浮动的汇率制度。在几次拉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元与当地货币汇率的相对固定，使得失衡的势能大量积累，一旦导火索事件发生，汇率的巨幅波动就在所难免。

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不稳定，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采取货币替代的方法来规避风险，美元化便是其中最极端的选择。在拉美，美元化有非官方、半官方和官方美元化几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是居民自发或是政府被动放弃国内货币信用的选择。迄今为止，尽管主要拉美国家有意识地推行“去美元化”，但是，美元在拉美地区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9 年 10 月，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开始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并表示要将本币结算体系逐渐扩大到“南方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南美地区的货币一体化进程。此后，在古巴哈瓦那

召开的玻利瓦尔美洲联盟峰会上，该联盟成员国又表示要用虚拟的苏克雷替代美元进行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一时间，“去美元化”的呼声好像又回荡于拉美大地。拉美国家的这些举措，反映出该地区对于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积极探索。但是，拉美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和货币价值的稳定性才是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基础。然而由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各国的货币汇率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拉美国家“去美元化”的行动还很难成为地区各国的统一选择。在此意义上，拉美地区的“去美元化”过程必定充满荆棘和曲折。

第四，长期较低的储蓄率无法满足投资的需求。拉美经济的另一个困局就是储蓄的长期不足，几个主要国家的储蓄率长期处于20%以下。有观点将储蓄率低的原因归结于拉美地区的文化，这不无道理。但工业化和城市化效率不高所导致的投资动力不强劲，也是无法大量动员和吸引储蓄的重要原因。再加上通货膨胀长期失控，本来就脆弱的储蓄意愿势必会受到强大的负面冲击。拉美地区的储蓄不足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即使在不高的投资率水平上，拉美地区国内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仍然无法满足投资的需求。

如今我们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将它们经历的不同危机及其应对措施进行比较，可以从中找出能为我所用或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又有中国走向世界必须与之合作的重要国家，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也走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并举的道路。但中国的选择是让自身更多地融入到国际市场中，以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入到全球分工浪潮中。这就使得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面向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从而为工业化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从属于工业化而展

开，工业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吸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积极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另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为中国持续地高储蓄、高投资提供了现实需求，并在资本项目审慎开放的格局下，出口导向下的储蓄输出最终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期。但大国经济的转型是路径依赖的。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同时伴有高外汇储备）和高增长为基本特色。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些中国特色将依然主宰我们的发展和转型道路。

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全局性问题，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从拉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第一，重视出口的重要意义。出口在未来对于中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再体现在实现 GDP 的增长上，而应该更多体现在通过国际竞争提升综合竞争力上；第二，用城市化引领工业化发展。已经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增长动力将更多地依赖于城市化进程。因此，我们必须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来引领工业化的纵深发展；第三，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四高”的模式不可能一步跳跃到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需要依靠优化投资结构来引领。这就要求在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让中国的投资进入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中，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导向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第四，注重分配公平问题。分配问题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分配公平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初次分配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长期缺失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大跃进都是接下来中国分配改革中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经历了其历

史上最好的增长周期之一。经济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公共外债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国际储备增加，以及宏观经济的明显改善，使该地区具备了比以前更强的风险承受力，其金融层面所受冲击的影响明显小于历次发源于本地的危机。相比较而言，危机对拉美和加勒比经济的影响更主要是通过对外部门进行的，比如国际贸易量的下降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

我院拉美研究所组织出版的这个研究报告就此次金融危机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和多视角的认真总结，进而分析了金融危机冲击下拉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选择。这对于了解和分析拉美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希望拉美研究所今后继续加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金融问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序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研究员

余永定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始终在探索和调整自己的增长模式。拉美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是促使中国制定以 FDI 为主引资政策的重要原因。中国决定采取东亚出口导向模式也是出于对拉美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认识。1995 年墨西哥危机再次给中国敲响警钟，使中国放慢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

拉美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一百多年来，拉美在欠发达和革命之间苦苦挣扎，用革命者的血和劳动者汗水积累起极其丰富的发展经验。在我看来，拉美经验是一座无与伦比的金矿。随着中国改革和开放进程的深入，随着这种深入带来的各种社会 - 经济矛盾的尖锐化，拉美经验将对中国改革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启示。探索发展的 paradigms，拉美经验不可或缺。拉美国家农业的 latifundia-minifundia complex，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脱节所产生的边缘化大众（marginal mass）或次无产者（sub-proletariat），拉美依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拉美的国家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comprador bourgeoisie）的发展，拉美自由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潮起潮落，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改革探索者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拉美相继发生重要政治变革。在拉美的广阔土地上，左翼和中左政府

相继上台。巨大的变革似乎在酝酿之中，或者这种变革已经开始退潮。由于距离遥远、由于语言障碍，尽管拉美如此值得我们关注，但我们对拉美的了解却如此之少。我们应该感谢拉美研究所为我们雪中送炭。我对于拉美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深信不疑，真诚希望拉美研究在社科院、在整个学术界大放异彩。

无论是涉及 paradigm 的综合问题，还是更为具体的政策或事件，拉美研究都值得高度重视。2008 ~ 2009 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为何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传递机制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应对之策？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如何在今后避免重蹈错误覆辙？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为了得出更富一般性，从而更具指导性的结论，对金融经济危机期间不同发展国家和遵循不同发展模式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了解的不仅有东亚国家，而且有拉美国家；不仅有印度，而且有巴西。拉美所为我们呈上的《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一书，满足了我们的学术需要，我们对拉美所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2008 年 9 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变成“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使得世界经济面临着自 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我们知道：

(1)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导致拉美国家出口陡降，经济陷入衰退。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拉美各国均出台了大规模公共财政刺激计划。

(2) 金融危机爆发后，拉美各国货币当局纷纷采取下调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为各国金融体系逐渐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3) 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货币一改 2007 年以前对美元升值的态势, 汇率全面下挫。其中, 巴西、智利和墨西哥 2008 年汇率贬值幅度分别为 35.3%、34.7% 和 23.8%。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稳定, 部分拉美国家货币汇率也有所升值, 但总体来看各国货币的购买力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4) 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国债市场, 拉美国家面临着资本流入突然逆转的巨大压力。但随着形势的逐渐稳定, 外资非理性的撤离现象开始缓和, 外资重新流入拉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一系列金融危机后, 拉美各国金融体系的抗外部冲击的能力似乎已经明显增强。但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拉美一些国家的主权风险急剧上升。

(5) 拉美国家银行业在危机期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拉美国家大部分商业银行并没有陷入经营困境, 这得益于较低的外部融资的依赖度、充足的流动性、介入美国“有毒资产”(次级抵押贷款) 程度有限等因素。金融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并没有出现不良资产大幅度上升的局势。

(6) 债务问题、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失衡是拉美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同时也是造成拉美国家数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经济结构改革以来, 拉美各国政府通过整顿财政纪律改善了财政状况。2003 ~ 2008 年, 全地区连续 6 年实现了初级财政盈余。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例由 2002 年的 58.2% 降至 2008 年的 27.8%。货币政策方面, 拉美各国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 其主要国家都实行了以控制物价稳定和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各国政府从法律(甚至宪法)上强化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稳定了市场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在经济结构改革中, 拉美国家放弃盯住汇率制度, 逐步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2003 ~ 2007 年, 拉美地区连续多年保持国际收支经常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 使得拉美地区外汇储备连续多年迅

速增加，2008 年整个地区外汇储备达到 5104.57 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

不难看出，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拉美国家能够化险为夷，是各国政府在拉美债务危机后痛下决心，逐渐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

从《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后危机时代，拉美国家也面临着同中国相似的危险。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前（2008 年 6 月末）拉美各国政府和私人部门持有美国资产总额超过 3800 亿美元。尽管拉美一些国家逐渐缩减了投资美国资产的比例，但仍面临着较大的美元贬值风险。但阿根廷 465 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总额仅为 86.36 亿美元。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尽管拥有大量的石油美元，但其长期坚定的“去美元化”政策，购买美国资产的比例较小，厄瓜多尔同样也只持有 13.1 亿美元。因此，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国家受美元资产贬值风险冲击相对较小。

此外，如何实现财政刺激政策退出，防止通货膨胀恶化；如何维持当前公共财政支出和经济刺激计划的可持续性，保持经济复苏的动力，也将是拉美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金融危机爆发后，拉美各国几乎都面临着流动性不足、信贷紧缩、金融市场波动等问题。由于对同 IMF 等国际组织打交道的痛苦经验记忆犹新，拉美国家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大量地向国际金融机构提出融资要求，而是采取了包括区域金融合作在内的各种金融政策调整抗御金融危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拉美国家对建立新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

美国的次贷危机通过各种渠道给世界其他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美国资产泡沫破灭对全球金融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难辞其咎。首先，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监护人的 IMF 对美国资本市场监管缺失，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